

第一篇

探寻新道路

第一章 探索任务的提出和初步的成果

一 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全面地建设这个崭新社会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

1956年，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要研究中国1956年及其以后年份的历史，必须了解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状况。

自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起，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并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尤其是东方大国新中国的出现并胜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切，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但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在其自身发展进程中，也长期地积累了一些问题，遇到了新的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在1956年里比较集中地暴露了出来。

经济上，苏联在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这既使苏联迅速发展而站稳了脚跟，并经受了苏德战争的严峻考验，又形成一种统得过死、比较僵化的模式，转而限制了苏联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发展缓慢，粮食总产量直至1953年还没有达到沙皇俄国最高年份1913年的水准^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

政治上，苏联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是与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和相伴随的。这与当时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有关，也与沙俄帝国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有关。更主要的，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又主要是斯大林），没有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初步巩固之后自觉地扩大党内外的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和必要条件。

^① 沙俄1913年粮食总产量为8,600万吨 苏联1953年为8,250万吨（见高成兴：《战后苏联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10页）。

过分集中而民主不足，个人崇拜的出现，以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上重大缺陷，导致苏联自30年代以来，发生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忠诚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红军的高级将领，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处决或流放^①，给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在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上，长期以来，斯大林和苏共既有贡献，也有重大错误。帮助了不少国家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支持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苏共在第三国际中居于领导地位，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都必须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实质上是苏共中央的领导，又加上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绝对地、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并以此作为衡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唯一标准，使得苏共领导人在历史上就形成了指挥、干涉他党他国事务的作风。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1947年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形式变了，作风未改，以苏联的利益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上，推行苏联的模式，以与之相适应；在国际活动和外交上，要求协调和服从于苏联的世界战略、策略甚至每一具体政策。由于有1943年德黑兰会议和1944年雅尔塔会议美苏英对战后世界势力的划分，又有战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

^① 据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苏共十七大的代表被杀和关的占50%多。中央委员被杀和关的占70%。又据有的材料说：1937年5月至1938年11月，被清洗的苏军高级将领，元帅3人，占60%；集团军司令13人，占86%；军长57人，占67%；师长110人，占56%；旅长220人，占54%。

阵营的出现和对峙，使得这种控制具备了客观条件。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袖铁托不愿受苏联控制，要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就被斯大林视为异己的力量，将南共开除出欧洲九国情报局组织，并把南斯拉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随后又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对一些具有独立性思想和要走自己建设道路的领导人，进行预防性清洗，制造了一些严重的错案。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一度怀疑是“第二个铁托”。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逝世，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斯大林时代”随之结束，开始了向新方针、新格局发展的转变期。苏联开始了逐步纠正斯大林时期错误的进程。1953年3月27日，释放了一部分斯大林时期关押的政治犯，4月4日，对斯大林生前亲自部署的“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集团案”平反；6月10日，苏共《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指出：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在于它的集体制。”7月，除掉了身居一人（斯大林）之下、万人之上，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的贝利亚，并开除其党籍，随即开始了陆续为屈死者恢复名誉的工作。1955年6月，赫鲁晓夫采取主动，同布尔加宁率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承认苏共过去对南共的态度是错误的，表示“衷心感到遗憾，并且要坚决消除这个时期的一切芥蒂。”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错误正面作了系统的揭露纠正，标志着这个转变期的结束。会前，苏共中央已决定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在事先拟定的中央工作报告中，写上了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坚决纠正其错误的内容。大会进行期间，一些代表要求中央具体揭发个人崇拜的后果。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说，在此情况下，主席团经过激烈争

论，最后决定让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随后，苏共中央于6月30日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尤其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的错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苏联党和国家就无法前进，因而这种揭露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

但是，暴露和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此重大而长期的问题，必然要产生强烈震动的；加之赫鲁晓夫的报告罗列斯大林的大量错误事实，用语激烈，感情气氛甚浓，却没有作冷静客观的理论分析，本人又没有作必要的自我批评，因此难以令人充分理解。而这些重大问题的揭露，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缺乏思想准备，却被美国搞到秘密报告抢先发表，掀起反共大浪潮，造成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极大被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员纷纷退党，出现了一时的混乱。

在经济建设方针上，苏共中央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农业加速发展的任务提到重要地位。苏联30年代集体化运动使得农业生产下降，长期发展缓慢，中间又经苏德战争的严重破坏，到战后的1945年，全国农业生产水平只相当于1940年的60%。1945年至1953年，恢复和发展也不快，第四个五年计划（1948—1952）农业的任务没有完成。1952年的农业总产量仅达到1940年的99%，1953年才只达到1940年的104%。改进农业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1953年8月，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同年9月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都对改进农业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和规定，包括大幅度削减自留地物产税和取消对某些财产（果树、奶牛等）的实物税，代之以一户家庭为单位按人口比例计算来收取现金的做法，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

格（提高40%—200%不等），以及一笔勾销集体农庄欠国家的过去未付清的农业税尾数等陈年老账。并从1954年起，开始对农业的体制进行改革，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取得了一时的效果。

在工业发展的方针方面，意见不一，并成为党内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1953年8月，马林科夫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来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把基本投资主要地用在发展重工业和运输系统方面，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来以和发展重工业同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必须大大增加投资，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作急剧的改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不过，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确保供应人民以粮食、供应轻工业以原料的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①当时，西方的评论将这种政策调整称之为“新方针”。苏联有一些经济学家接受这种说法，并论证和宣传这种“新方针”。

但是，长期以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心的思想仍然占据主要地位。1955年1月底，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不指名地对马林科夫和一些经济学家进行批评，说“象过去一样，党认为发展重工业是首要的任务”，党“曾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发展重工业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现在和将来“也仍然要坚决执行这条路线”。又说，近来一些人“在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起来了”，“这是右倾的复活，是与列宁敌对的观点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噶林那一伙人就曾经宣传过这种观点”。提出要同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们进行斗争。2月8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解除他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申请。继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布尔加宁发表讲话说：过去“党

^① 195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在和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走狗进行的尖锐斗争中捍卫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政府在经济方面今后仍要坚决实行共产党规定的尽力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

苏联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路线，不但使得自己的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落后，也对东欧国家的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由于资金主要投入到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得很差，这就积累起严重的社会矛盾。在这一时期中，党内过“左”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也造成了党内危机。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后，这些国家中随之出现了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政局开始动荡不稳。

苏联在长期建设社会主义中积累的问题和斯大林错误被系统地揭露，引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密切注意。他们开始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通过总结建国几年来自己的建设经验，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走怎样的道路。

1955年12月，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省市负责人会议上，传达和部署了将于1956年下半年举行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为了准备八大的政治报告，检查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执行情况，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他分批约集了工业交通部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听取汇报和座谈。刘少奇陆续提出了关于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战时与平时等关系方面的意见。1956年初，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在听取工业部门的汇报，感到很好，要薄一波也给他组织汇报。从2月到4月，毛泽东连续听取了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汇报，边听汇报边议论。最后毛泽东汇总成10个问题，在4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随后的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是后来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中经济建设部分的理论依据，也

是周恩来主持制定“二五”计划的重要依据。

《论十大关系》讲了：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关系。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但是，我们“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②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根据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约有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状况，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他估计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在短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10年或者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② 同上书，第268—269页。

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指出应该抓紧时间发展和利用沿海工业，因考虑战争危险，“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①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30%，“这个比重太大了。”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使它降到20%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会有自己的原子弹”。“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②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必须兼顾三者的关系，“不能只顾一头”。他还特别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他打比喻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要求：“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③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说：“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也要求省市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0页。

② 同上书，第270—271页。

③ 同上书，第272页—274页。

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框得太死。同时他还说：“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①

在中国和外国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直接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自己实践经验的结晶。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任务，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思想。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回顾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毛泽东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上，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思想，《论十大关系》是他正确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从这时起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对如何全面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思想，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正确决策。这一切，构成了一条八大的正确路线。

二 中共八大的正确决策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277页。

^② 同上书，第285页。

行。这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这次大会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社会主义时期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八大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一个长时期阶段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①这段话，实际也是八大路线精神的集中概括。它也清楚地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自1954年起，就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步骤作了反复考虑。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②在这里，毛泽东把总目标的实现，分成头15年和50年（含头15年）两个阶段和步骤。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把这两个步骤所要达到的阶段目标分别定为：15年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50年是“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③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3页。

② 同上书，130页。

③ 同上书，第139页。

泽东又把50年的时间增加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①

中共八大鉴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上建立起来的情况，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头15年的建设目标，着重讲了工业化方面的任务，规定：“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3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②对于15年以后的发展目标，八大没有去涉及。但八大所谈的15年目标，正是毛泽东关于50年到75年设想的组成部分。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又谈及长远目标，他写道：再过45年，“也就是进到20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③党的八大制定的党章总纲，还规定了“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的四化要求。

15年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0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是党提出的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构想。它包含了长远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它反映了当时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是半个世纪以上的长期奋斗过程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6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1—312页。

的一个重大战略考虑。

八大正确地解决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第一，正确规定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

建国后的头七年中，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党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同时，便开始把生产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即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也没有放松经济建设，其他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的。各项民主革命任务的逐一完成，都切实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有计划的建设开了路。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保证。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而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些论断，在实际上指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应该转移。

党的工作着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整个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也是注意到苏联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分析斯大林30年代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原因时说：当苏联的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者很少的时候，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人民已经要求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期，斯大林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以往那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犯错误的根源。

第二，初步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和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八大依据《论十大关系》的精神，提出了“正确调整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的任务。要求“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门的工作。”^①规定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八大之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总的精神，是把一部分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单位，以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也不至于损害统一领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77页。

导和重点建设。这种以简政放权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是试图突破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传统模式的最初的努力。

在经济模式上，建国初的几年，由于对社会主义持单一公有制即“纯社会主义”的理解，加上三大改造工作上的缺点，1956年中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经营管理过分集中，统得过死，一些商品短缺，规格单一、质量下降，人民生活不便等情况。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都提过一些改进的意见。八大进一步总结了经验，周恩来在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应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因此，“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这“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①

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更明确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格局，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216页。

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①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吸收了周恩来、陈云的这些重要意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内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②随后，党和国家按照这种模式，对国民经济结构作了一些调整。在城镇，分散了一部分过于集中的小手工业和小商业，个体经济和自由市场也有所恢复和增加。在农村，允许一部分生产资料如鱼塘、菜地、果园、桑园、成片林木等可以暂不入社，归原主经营；允许社员家庭饲养一定数量的大牲畜；增加了社员的自留地，由原定一般不超过当地人均土地的5%，增加到不超过10%；允许副业生产等采取大公经营、小公经营和个体经营等多种方式。这就使一度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了的国民经济增加了比较多的活力。这对于搞好1957年的经济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正确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和若干经济政策。

如何正确认识国情，恰当处置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充满信心地预言：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和共产党的领导，加上其他条件，“中国经济建设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③建国初的几年，不但有尽快建设好国家的决心与信

① 《陈云文选》（1956—1985）第13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0年第1版第1435页。

心，而且有符合国情的方针作指导。从1955年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执行“一五”计划时起，到1955年上半年，党在社会主义改造上的方针是反“左”反右、15年左右逐步过渡。毛泽东说：“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1年又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①在经济建设上的方针，是有计划按比例、积极而又稳步地发展前进。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3年恢复，10年、20年发展”，“中国工业化，是10年、20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②

但是，经过几年的顺利发展，毛泽东从1955年下半年起，嫌原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速度都太慢了，认为应该大大加快。于是，有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批评，说他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右倾”，“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③，给“击一猛掌”，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推上了急速发展的轨道；又有同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提出了各项建设事业也都要大大加快和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要求^④，成为1956年发生冒进的重要原因。

1955年12月，刘少奇听取工业部门汇报，周恩来总结建国几年来经济建设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毛泽东赞成说：多快好提得好。李富春建议加了“省”字，毛泽东也赞同。从而形成了一个“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2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34、2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4页。